

生存于不可预知的未来：多元化时代的苦果与文明的药方

[法] 安托万·当尚 (Antoine Danchin)

全志钢 译

一、文化交际背景

1964年夏天,幸逢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中国新设法国大使馆,我得以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正是在那时我才明白被别人看穿是一种什么滋味,而且是被一个组织严密、头脑里装着一种自有其合理性的思想体系的群体看穿。身为西方学生的我们是那里的“他者”,虽然被当做客人来接待,并因而受到保护,但同时我们也被当做“人民的敌人”来对待。我是在与一位不那么迂钝的翻译谈话时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立刻便想到了毛泽东那篇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的短文^①。于是我问道,为什么我自动就成为了人民的敌人?为什么我不是人民的朋友?我辩解说,在这样一个被保罗·尼赞(Paul Nizan)描绘为“那时我二十岁,别跟我说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②的艰难时代,我作为一个刚刚开始为建设自己的人生而奋斗的年轻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我的青春期的困惑和冲突,都自然而然地使我属于人民的朋友的行列。何况,就在不久以前,我还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我的这种态度还招致有人将一公斤的炸药包扔到了我卧室的窗台上,之所以得以幸免,是因为在那炸药的引线外包着一层火绒芯,火绒芯外又裹着一张写了收件人名字的纸,而那张纸被打湿了——那一天雨下得很大——

^① Mao Tse Tung (1957). *De la juste solution des contradictions au sein du peuple*, Pékin: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65.

^② P. Nizan (1931). *Aden Arabie*. Paris: Rieder.